

# 《明内廷规制考》考述

——基于《春明梦余录》与方志《天府广记》的考证

杨俊涛

**提要：**《明内廷规制考》与《春明梦余录》均为记述明代典章制度与北京建制沿革的重要史志文献。从内容上看，《明内廷规制考》与《春明梦余录》卷6至卷13内容高度重合，两书当存在抄录关系。经考证，《明内廷规制考》成书于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至明亡，早于《春明梦余录》，是《春明梦余录》的抄录来源之一。结合两书相异部分与《西垣笔记》《北游录》等文献，可考《明内廷规制考》作者为孙承泽，且该书之佚名为孙氏刻意为之。另外，由于《春明梦余录》与孙氏所著方志——《天府广记》著录方式相同，且《明内廷规制考》与《天府广记》内容恰好相错，可知三书间存在先后抄录关系，且抄录内容的选择亦是孙氏有意为之。

**关键词：**《明内廷规制考》 《春明梦余录》 《天府广记》 孙承泽 《明制女官考》

《明内廷规制考》3卷，是记述明代京师阙殿额名、朝制章服、卤簿御乐、讲筵书籍、朝仪戒谕、宫官内官等内廷典章制度的重要宫廷文献，祖本已佚，今存嘉庆年间张海鹏《借月山房汇钞》刻本。<sup>①</sup>该书作者佚名，亦“不著编辑姓名”，“大而内外朝仪，细而门阙扁额，牖举无遗”<sup>②</sup>。孙承泽《春明梦余录》是记述明代典章制度、建置形胜、职官品秩、掌故风物等情的重要史志文献。该书70卷<sup>③</sup>，今存清宋宾王抄本20册<sup>④</sup>、光绪七年（1881）南海孔氏岳雪楼重校刻本25册、清光绪八年刊本24册、光绪九年广东古香斋鉴赏袖珍本24册<sup>⑤</sup>与广州惜分阴馆重刻古香斋本24册。<sup>⑥</sup>孙承泽《天府广记》44卷<sup>⑦</sup>，书中“天府”指京畿之地。《天府广记》是记载明代京师人物官署、诗赋艺文、险隘分野、漕渠水利、风习治所等地情的“大型的都邑志书”<sup>⑧</sup>。该书有5种旧抄本<sup>⑨</sup>、1962年北京出版社点校铅印本<sup>⑩</sup>与1982年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本。<sup>⑪</sup>关于《明内廷规制考》，相关研究尚为空白，因此本文拟结合《春明梦余录》《天府广记》等文献对该书成书年代与作者进行系统考证。

① 参见张之洞：《书目答问》，“续修四库全书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史部，第921册，第610页。

② 王灿炽：《燕都古籍考》，京华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268页。

③ 参见郝志群主编：《北京史百年论著资料索引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565页。

④ 参见宋宾王校并跋，今藏于国家图书馆。

⑤ 参见孙承泽：《春明梦余录》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，1990年，第1页。

⑥ 参见王灿炽：《北京史地风物书录》，北京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2页。

⑦ 参见孙承泽：《天府广记》，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”，齐鲁书社，1996年，史部，第249册，第1页。

⑧ 王灿炽：《燕都古籍考》，第266页。

⑨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图书馆。

⑩ 参见王灿炽：《北京地方历史文献述略》，《文献》1981年第2期。

⑪ 参见王灿炽：《北京史地风物书录》，第2页。

## 一 成书年代考

据对比,《明内廷规制考》与《春明梦余录》两书内容高度重合,且有诸多字词、段落完全相同。王灿炽亦在《燕都古籍考》中记载两书内容“几乎完全一致”<sup>①</sup>。因此,两书之间当为抄录关系。经过爬梳,两书内容虽基本一致,但均存在相异内容。例如《明内廷规制考》卷2“朝制”条末句较《春明梦余录》缺少“此深得建国亲侯之意”<sup>②</sup>;与此相对,《明内廷规制考》卷2“东宫亲王讲读”条末比《春明梦余录》多出“(掾吏)之书又不及诸待诏”<sup>③</sup>。因此有必要探讨两书先后顺序。前人曾以《明内廷规制考》将崇祯帝称为“上”而判定该书的成书年代大致在明末。<sup>④</sup>实际上,该书亦称朱棣为“上”,例如卷3“宫人杂事”条记有“永乐末年,上有疾”<sup>⑤</sup>。可见该书中,明朝各帝均可称为“上”。“上”并非特指在位君主,故该解释有待考究。

《明内廷规制考》所记明代内廷典章制度起于洪武,迄于“崇祯十六年五月”<sup>⑥</sup>。因此该书成书时间当在崇祯十六年五月之后。另据该书卷2“东宫亲王讲读”条末段中“然宋朝立学时有考较,本朝唯以中官领之”<sup>⑦</sup>,与《春明梦余录》卷11“武英殿”条“然宋朝立学时有考较,至明唯以中官领之”<sup>⑧</sup>,可知此处“本朝”指代明朝。因此《明内廷规制考》成书年代应为崇祯十六年五月至明亡。据孙承泽《庚子销夏记》自述“庚子四月之朔……重订所著《梦余录》”<sup>⑨</sup>,可知孙承泽在顺治十七年(1660)四月完成《春明梦余录》修订工作。因此《明内廷规制考》的成书时间早于《春明梦余录》。这意味着孙承泽《春明梦余录》基本抄录了《明内廷规制考》主要内容。另外,鉴于孙承泽著述时经常抄录《皇明典礼志》《大明会典》《续文献通考》等前人文献,因此《春明梦余录》抄录《明内廷规制考》也在情理之中。

若从两书内容之正误推导时间顺序,亦可佐证《明内廷规制考》成书时间更早。经对比,《明内廷规制考》虽在卷数、内容上远少于《春明梦余录》,但其内容更加正确,而《春明梦余录》常存错讹。《春明梦余录》中最典型的错讹便是关于“八间殿”的记载:“承运殿之两庑为左右二殿。自八间殿之后,前中后三宫各九间。”<sup>⑩</sup>笔者遍寻明清史料,均未发现“八间殿”记载。巧合的是,《皇明典礼志》卷19<sup>⑪</sup>、《礼部志稿》卷63<sup>⑫</sup>、《明史》卷68<sup>⑬</sup>、《六典通考》卷25<sup>⑭</sup>、《日下旧闻考》卷33<sup>⑮</sup>、光绪《顺天府志》<sup>⑯</sup>等传世文献在记述此条时,均载

① 王灿炽:《燕都古籍考》,第269页。

② 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,商务印书馆,2005年,子部,第287册,第538页。

③ 佚名:《明内廷规制考》,中华书局,1991年,第48页。

④ 参见梁继红:《明代皇史宬门额题字考》,《中国档案研究》2018年第1期。

⑤ 佚名:《明内廷规制考》,第63页。

⑥ 佚名:《明内廷规制考》,第64页。

⑦ 佚名:《明内廷规制考》,第48页。

⑧ 孙承泽:《春明梦余录》,第97页。

⑨ 孙承泽:《庚子销夏记》,《四库全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年,子部,第826册,第2页。

⑩ 孙承泽:《春明梦余录》,第56页。

⑪ 参见郭正域:《皇明典礼志》,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”,史部,第270册,第710页。

⑫ 参见林尧俞等编:《礼部志稿》,《四库全书》,史部,第598册,第60页。

⑬ 参见《明史》,中华书局,1974年标点本,第1670页。

⑭ 参见阎镇珩:《六典通考》,“续修四库全书”,史部,第758册,第326页。

⑮ 参见于敏中等编:《日下旧闻考》,北京古籍出版社,1983年,第494页。

⑯ 参见周家楣、缪荃孙等编:光绪《顺天府志》,北京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57页。

“承运殿两庑为左右二殿。自存心、承运周回两庑，至承运门为屋百三十八间，殿后为前中后三宫各九间”。可见《春明梦余录》所谓“八间殿”并不存在，其误在于遗漏了“存心、承运周回两庑，至承运门为屋百三十”十余字，以致“八间”与“殿后”连为一体，形成所谓“八间殿”的错误记载。因此《春明梦余录》关于该部分记载应为抄录，非为初著，更未经过细致考订。

关于孙承泽遗漏此处十余字的原因，或可从最早记载该句的明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刘汝康刻本《皇明典礼志》中找到答案。据观察，此处所漏词句之首尾恰好对应《皇明典礼志》卷19第7页次面第1列与第2列的相邻位置。<sup>①</sup>这意味着孙承泽抄录此条时出现错行。与《春明梦余录》相同，成书于清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的孙氏另一著作《天府广记》也存有此误<sup>②</sup>，可见孙氏晚年长期未识“八间殿”之误。但在《明内廷规制考》中，此句却记载完整。因此，《明内廷规制考》的成书时间当早于《春明梦余录》与《天府广记》。

除“八间殿”之误外，孙氏《春明梦余录》《天府广记》中还有“其制：山川二坛”<sup>③</sup>之误。据《明内廷规制考》与光绪《顺天府志》等文献，此处应记为“其制：社稷、山川二坛”<sup>④</sup>。综上所述，孙承泽在抄录前作《明内廷规制考》的过程中应偶有纰漏，以致后来从《春明梦余录》转抄至《天府广记》时，或将《春明梦余录》多处错误进行了二次记载。“八间殿”与“其制：山川二坛”<sup>⑤</sup>也成为孙承泽晚年著作中独有的代表性误记。

## 二 佚名考

关于《明内廷规制考》的作者，前人陈东原曾依据“黄百家《明制女官考》，实即《规制考》中之一节”<sup>⑥</sup>，怀疑《明内廷规制考》为黄宗羲之子黄百家所作。经笔者对照，《明制女官考》<sup>⑦</sup>与《明内廷规制考》卷3“宫官”条虽内容相似，但经细致校勘，便可发现两书存在诸多差异，非为抄录或包含关系。例如，《明内廷规制考》中记“司言”下属女史四人，“司阍”二人，“典乐”四人，“掌乐”四人，“典饰”四人，“司衣”、“司酝”与“司苑”下属女史二人，“司珍”与“司彩”下属女史六人。而《明制女官考》记“司言”下属女史二人，“司阍”六人，“典乐”二人，“掌乐”二人，“典饰”二人，“司衣”、“司酝”与“司苑”下属女史四人，“司珍”与“司彩”下属女史四人。<sup>⑧</sup>由于两书对诸多官职的人数记载存在明显不同，因此两书应无关涉。

另外，关于女官六局二十四司职事的记载，《明内廷规制考》与《明制女官考》的记述也存在差异。例如，《明内廷规制考》记“司籍”掌“经籍教授笔札几案之事”，“司宝”掌“宝符

① 参见郭正域：《皇明典礼志》，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”，史部，第270册，第710页。

② 参见孙承泽：《天府广记》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56页。

③ 孙承泽：《天府广记》，第56页。

④ 周家楣、缪荃孙等编：光绪《顺天府志》，第58页。

⑤ 孙承泽：《春明梦余录》，第56页。

⑥ 陈东原：《中国妇女生活史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5年，第165页。

⑦ 《明制女官考》有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）檀几丛书版本与1914年香艳丛书版本。由于1914年香艳丛书版《明制女官考》“司宝”条下同时存在“女史二人、女史四人”的错误记载，故本文主要选取成书年代更早，内容无错漏的康熙三十四年檀几丛书版《明制女官考》进行讨论。

⑧ 参见黄百家：《明制女官考》，“丛书集成续编”，上海书店，1994年，史部，第40册，第747页。

契图籍”；而《明制女官考》记“司籍”掌“经籍图书笔札几案之事”<sup>①</sup>，“司宝”掌“宝玺符契”<sup>②</sup>。很明显，两书对“图书”“图籍”归于何官管辖的记载存有出入。其次，两书在遣词用语方面亦存在差异，例如《明内廷规制考》记“司仗”掌“羽舆仗卫之事”，而《明制女官考》记“司仗”掌“凡朝贺，帅女官擎执仪仗”。如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若《明制女官考》为《明内廷规制考》中一节，则黄百家不必以两种表述方式描绘女官职事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两书非为同一作者。

关于《明内廷规制考》的作者，《借月山房汇钞》《丛书集成新编》《燕都古籍考》等书籍均载“佚名”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明内廷规制考》卷2“朝制”条下引用《西垣笔记》6段内容<sup>③</sup>。据《钦定续文献通考》卷80记载，《西垣笔记》为孙承泽所著<sup>④</sup>，可知《明内廷规制考》在明代成书，却记有孙承泽本人著述。再结合清初文化高压环境下，孙承泽“辑崇祯事若干卷，不轻示人，又著《春明梦余录》若干卷，并秘之”<sup>⑤</sup>，“撰《四朝人物传》，其帙繁，秘甚”<sup>⑥</sup>等私家秘密著述行为，可知旁人难以得见孙承泽私人笔记——《西垣笔记》<sup>⑦</sup>，遑论引用、抄录。加之孙承泽为明末清初历史人物，曾先后在明宫廷、大顺政权与清廷任职<sup>⑧</sup>，故难有人比孙氏更熟悉明代宫廷典章制度。综上可知，《明内廷规制考》应由孙承泽本人所著。

至于《明内廷规制考》佚名的原因，或可从谈迁的记述中看出端倪。清初，谈迁与友人吴伟业等交游，记述了吴伟业向孙承泽恳求借阅孙氏所著《四朝人物传》一事：“太史恳年余，始借若干首，戒勿泄，特示余曰：君第录之，愿勿著其姓氏于人也。”<sup>⑨</sup> 据此可见，孙承泽不仅秘密著录前朝遗事，还刻意隐去自己姓名，并交代亲近友人勿著其名。以此推及《明内廷规制考》，可想见该书之“佚名”应为孙承泽有意为之。

### 三 著录方式考

在《天府广记》卷首，孙承泽自述“都门八十岁老人孙承泽纂”<sup>⑩</sup>，因此《天府广记》的成书时间应是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<sup>⑪</sup>，晚于《春明梦余录》约13年。经对比，《春明梦余录》与《天府广记》大部内容相同或相似，许多词句完全一致，因此两书也存在明显的抄录关系。两书虽同为孙承泽所撰，但存在较为明显的体例差异与内容增减，以致《四库全书》将《春明梦余录》列于“子部·杂家类”<sup>⑫</sup>，而将《天府广记》列于“史部·地理类”<sup>⑬</sup>。

据文献，《天府广记》卷10即为《春明梦余录》卷23—28之整合；孙承泽不仅合此6卷为

① 黄百家：《明制女官考》，“丛书集成续编”，史部，第40册，第747页。

② 黄百家：《明制女官考》，虫天子辑：《香艳丛书》第11集，中国图书公司，1914年，第13页。

③ 参见佚名：《明内廷规制考》，第34—35页。

④ 参见嵇璜、曹仁虎等：《钦定续文献通考》，《四库全书》，史部，第628册，第277页。

⑤ 谈迁：《北游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第55页。

⑥ 谈迁：《北游录》，第117页。

⑦ 参见孙承泽：《春明梦余录》，第160页。

⑧ 参见阎崇年：《清代史坛大家孙承泽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83年第1期。

⑨ 谈迁：《北游录》，第117页。

⑩ 参见孙承泽：《天府广记》，第1页。

⑪ 参见王灿炽：《燕都古籍考》，第265页。

⑫ 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，子部，第287册，第509页。

⑬ 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，中华书局，1997年，第1043页。

1卷,也将此6卷中卷27“光禄寺”<sup>①</sup>和卷28“中书科”<sup>②</sup>的先后顺序调换;另外,孙承泽还对戎政府、翰林院、詹事府等诸多官署的先后顺序进行重新调整,并将《春明梦余录》卷15之“山川坛”与“先农坛”分列于《天府广记》卷7<sup>③</sup>与卷8<sup>④</sup>;将《春明梦余录》卷14“天坛”条扩充为《天府广记》卷6“郊坛”条<sup>⑤</sup>;另增《天府广记》卷2“府县治”条、卷3“学宫”条、卷22“宝源局”条、卷33“人物一”、卷34“人物二”<sup>⑥</sup>、卷38“寺庙”、卷41“赋”、卷42“诗(一)”<sup>⑦</sup>、卷43“诗(二)”<sup>⑧</sup>和卷44“诗(三)”<sup>⑨</sup>等内容,同时删去“崇祯朝的事迹、奏疏和比较碍眼的文字”<sup>⑩</sup>。书中类似的调整、增删还有很多。经孙氏辑修,《天府广记》最终完稿。据此可知,孙承泽将《春明梦余录》诸卷压缩归并,增删内容,调整次序,改变体例,从而著成《天府广记》。

事实上,《春明梦余录》的著录方式与《天府广记》相同。经勘查,《春明梦余录》卷6—13中的《附载宫殿额名考》<sup>⑪</sup>、文华殿<sup>⑫</sup>、文华傍室<sup>⑬</sup>、仁智殿<sup>⑭</sup>、文渊阁<sup>⑮</sup>、皇史宬<sup>⑯</sup>、宫官<sup>⑰</sup>、内官监<sup>⑱</sup>分别对应《明内廷规制考》的宫殿额名<sup>⑲</sup>、讲筵<sup>⑳</sup>、东宫亲王讲读<sup>㉑</sup>、中宫朝仪<sup>㉒</sup>、书籍<sup>㉓</sup>、国史<sup>㉔</sup>、宫官<sup>㉕</sup>、内官品职<sup>㉖</sup>。另有《春明梦余录》的“武英殿”条<sup>㉗</sup>被列于

① 参见孙承泽:《春明梦余录》,第293页。

② 参见孙承泽:《春明梦余录》,第298页。

③ 参见孙承泽:《天府广记》,“续修四库全书”,史部,第729册,第590页。

④ 参见孙承泽:《天府广记》,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”,史部,第248册,第508页。

⑤ 参见孙承泽:《天府广记》,第58页。

⑥ 参见刘森:《孙承泽及其著述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1995年第4期。

⑦ 参见孙承泽:《天府广记》,“续修四库全书”,史部,第730册,第241页。

⑧ 参见孙承泽:《天府广记》,“续修四库全书”,史部,第730册,第269页。

⑨ 参见孙承泽:《天府广记》,第723页。

⑩ 孙承泽:《天府广记》,《出版说明》,第2页。

⑪ 参见孙承泽:《春明梦余录》,第39页。

⑫ 参见孙承泽:《春明梦余录》,第82页。

⑬ 参见孙承泽:《春明梦余录》,第95页。

⑭ 参见孙承泽:《春明梦余录》,第97页。

⑮ 参见孙承泽:《春明梦余录》,第100页。

⑯ 参见孙承泽:《春明梦余录》,第106页。

⑰ 参见孙承泽:《春明梦余录》,第56页。

⑱ 王灿炽记载孙承泽将《春明梦余录》中“宫官”与“内官监”条目移入《天府广记》“礼部”条下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例如,《春明梦余录》卷6“内官监”条目内容“内官监通掌内史……悉内地中”与《天府广记》卷15“礼部上”所载“内官监监官不覆奏……尤严”内容并不相同。两条并未移入《天府广记》。经查,此两条在《明内廷规制考》中,除标题“内官监”更为“内官品职”外,两条内容未变。

⑲ 参见佚名:《明内廷规制考》,第7页。

⑳ 参见佚名:《明内廷规制考》,第42页。

㉑ 参见佚名:《明内廷规制考》,第45页。

㉒ 参见佚名:《明内廷规制考》,第57页。

㉓ 参见佚名:《明内廷规制考》,第48页。

㉔ 参见佚名:《明内廷规制考》,第50页。

㉕ 参见佚名:《明内廷规制考》,第60页。

㉖ 参见佚名:《明内廷规制考》,第66页。

㉗ 参见孙承泽:《春明梦余录》,第97页。

《明内廷規制考》卷二“东宫亲王讲读”条末；《春明梦余录》卷7“正殿”与卷8“殿门”合并、缩减为《明内廷規制考》卷2“朝制”条<sup>①</sup>。据此可知，孙承泽在《明内廷規制考》的基础上增删内容，调整次序，改变体例，从而著成《春明梦余录》。因此从著录手法的角度分析，三书之间存在明显且相似的抄录与辑修关系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孙承泽著《天府广记》44卷时，从《春明梦余录》70卷中辑出大部，但所辑内容恰好避开《明内廷規制考》内容（即《春明梦余录》卷6—13），以致《明内廷規制考》所载为《天府广记》所无，《天府广记》所载亦为《明内廷規制考》所无。从常理推断，此种错开现象为巧合的可能性较小，应是孙承泽有意为之，旁人难以做到。据此可侧面佐证《明内廷規制考》作者为孙氏本人。

综上所述，《明内廷規制考》与《天府广记》虽未完全涵盖《春明梦余录》全部内容，但从三书的记述内容、侧重点和著录方式等角度分析，三书作者同为孙承泽。从抄录顺序上看，《春明梦余录》抄录了《明内廷規制考》，随后《天府广记》抄录了未见于《明内廷規制考》的《春明梦余录》部分内容。

## 余 论

孙承泽在崇祯十六年至十七年间利用职务之便，著成《明内廷規制考》。后来，孙氏从清廷致仕，以暮年在《明内廷規制考》3卷的基础上著成《春明梦余录》70卷。13年后，孙氏又从《春明梦余录》中辑出未见于《明内廷規制考》的部分内容，并增补适当内容，从而定稿《天府广记》44卷。由于孙承泽晚年抄录前作《明内廷規制考》时偶有“八间殿”、“其制：山川二坛”等错误，以致《天府广记》继承了《春明梦余录》的错误内容。

据《明内廷規制考》末段“有长白昌龄及棟亭曹氏藏书印记”<sup>②</sup>等记载，《明内廷規制考》成书后被曹寅<sup>③</sup>与其甥富察·昌龄<sup>④</sup>收藏，继而又被藏书家孙从添、张海鹏之父与张海鹏收藏，最终经张海鹏刻印，得入“借月山房汇钞”而流传于世。但因孙承泽刻意不著姓名，并在其有生之年秘密度藏，以致该书在众多文献中被记为作者“佚名”，实乃文献流传一大憾事。

（作者单位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程方勇

① 参见佚名：《明内廷規制考》，第31页。

② 佚名：《明内廷規制考》，“丛书集成新编”，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1985年，第29册，第268页。

③ 曹寅（1658—1712），清代著名文学家、藏书家，字子清、幼清，一字棟亭，号荔轩、雪樵。汉军正白旗人，世居沈阳，官至江宁织造。因家门外，种有棟树数株，建一小亭，以为藏书赏画之处，故名“棟亭”。

④ 富察·昌龄，满洲镶白旗人，富察氏，通“傅察”“敷槎”，亦被人尊称“傅察太史昌龄”（昭珩：《啸亭杂录·昌龄藏书》），字晋衡，一字堇斋。清代著名藏书家，生卒年待考，雍正元年（1723）进士，累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（李文藻：《南涧文集·琉璃厂书肆记》），康雍乾时期大臣富察·傅鼐之长子。曹寅外甥，曹雪芹姑父。祖上有军功，世居长白，故称“长白昌龄”。其收藏之书多盖“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”印章。江宁曹氏败落后，昌龄大量收购舅舅曹寅藏书。